

施蛰存先生学术传略

刘 凌

一

施蛰存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翻译家。他以小说和诗的创作被国际文坛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大师，其作品至今在海内外拥有广大的知音，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他在高校任教后又成为一代名教授，是众所周知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严谨学者。

1905年12月3日，施蛰存生于杭州水亭址学宫旁的老屋。施家世代儒生书香传家，施蛰存的父亲名亦政，字次于，为浙江仁和县秀才，与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马叙伦和政治外交家的黄郛以同窗、同进学为知交。科举废除后，其父即设家塾招生授课谋生，以擅长文章、书法受知于富于新思想的洋务派清吏陆勉侪。陆勉侪被任命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后，聘请其父担任文书并兼理学堂图书。由此施家一起迁往学校所在的苏州，先后住在鹊桥弄、醋库巷等处达六年。

施蛰存于1910年6岁时入比邻徐氏家塾，老师为他取学名德普，字蛰存。辛亥革命后师范学堂改组，父亲失业闲居，施蛰存于1913年随父亲移居江苏松江县（今属上海市）。父亲赋闲经年后，适逢陆勉侪又以所集资银二万两在松江创办履和织袜厂，此

厂当时为全国第二家织袜厂，其父被陆勉济任命为经理，从此他家境日渐好转。这一年秋天，施蛰存进松江县第三小学读书。1917年12岁时初小毕业，升入松江县第一高等小学。小学附近随处可见的小书摊向他打开了一个灿烂动人的世界。他接连购阅《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济公传》等古代小说。《济公传》当时影响很大，自二续、三续、四续直至二十四续，他每一续都有。梁山好汉的神出鬼没、劫富济贫和所向无敌的描述，使他充分感受到小说艺术的魅力和深刻的人生启迪，他常觉得书中的人物仿佛就在身边活动。他是长子，不喜与四个妹妹为伴。放学回家，关了门就专心一意地在书海中沉潜漫游，也从此养成他一生独立不倚的性格。

1919年施蛰存14岁升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读小学时早已萌动的文学爱好，这时转向唐宋诗歌。15岁作了第一首拟汉魏乐府《自君之出矣》的绝句体式五言诗。那时他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词章家，施蛰存受其影响，从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和沈曾植的《海日楼诗》，一直向上追溯读了宋代苏轼的《东坡集》、黄庭坚的《豫章集》和陆游的《剑南诗稿》。当时他做了一首七律：

“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钟声残。一江烟水茫茫去，两岸芦花瑟瑟寒。浩荡秋清几回复，苍黄人事有波澜。迩来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一位比他年长10岁很有旧诗修养的友人看了后，批了一句“神似江西”，他受到很大激励。他有计划地熟读了唐诗名著《杜工部诗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李义山诗集》、《温飞卿集》等，并摹仿李、贺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诗风，作了《安乐宫午场诗》等。他并试着写了不少新诗，用不同的笔名寄给邵力子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中学三、四年级时，英文课都以原版书为教材，他读英文也最为勤苦，自此对外国文学的涉猎也大为开拓，对他影响很大。当时，他从《新青年》、《新潮》中，获得新的思想，他写了多篇

小说，逐渐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施蛰存于1922年中学毕业，他很想报考北京大学，只是父母爱子心切，只允他报考上海及附近地区的大学。最终，他以英语极优被基督教会所办的杭州之江大学录取。他在之江大学一年级就读时和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毕业班学生戴望舒、张元定（张天翼）、戴克崇（杜衡）组织兰社，并出版铅印的16开四版《兰友》旬刊。施蛰存除在《兰友》发表作品外，还以青萍、施青萍署名在《星期》、《半月》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寓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写实主义小说。在他此后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曾用过安华、乌尼、李万鹤、苹华室、曾敏达、陈蔚、北山、舍之、蛰庵、丙琳、秋浦等笔名。

在之江就读仅一年，因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触犯了教会大学的诫条而被迫退学。1923年暑假后就与戴望舒一起回沪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4年秋改入大同大学，1926年与杜衡同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并和戴望舒、杜衡创办以《瓔珞》为名的文艺刊物。他近年写的《浮生杂咏》曾回忆读大学的历程：

“西京弟子有师法，东京游士无定师。栖栖遑遑四寒暑，朽木石雕成支离。”他学无定师，无所师承，从不攀附名家。这年秋天，经原上海大学同学陈钧介绍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施蛰存于1927年秋任松江联合中学语文教师，第二年转往松江县立中学任教。1928年初，《小说月报》发表了他的《娟子》，并与戴望舒等创办了两种文学刊物，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至抗战前他编辑的刊物有八种之多，其中以主编《现代》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抗战前的十年是施蛰存文学写作的辉煌时期，他创作和出版了大量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并翻译了英国、奥地利、挪威、波兰、匈牙利小说多种。他写的作家评传，有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第一辑的《魏琪尔》。他编的

《现代创作丛刊》和与阿英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及他校点的古代小说名著《金瓶梅词话》、《西游补》以及编注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也先后出版。

由于朱自清的推荐，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给施蛰存发来了聘书，遂于上海沦陷前到昆明执教。抗战期间他转徙各地，在几所学校任教，并出版了宣传抗日的四本散文集。抗战胜利至建国前，施蛰存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与周煦良合作创办了一个以刊登翻译作品为主的刊物。他笔耕不辍，不断有散文、杂文、译文和小说在各报刊发表或出版。

建国初期，施蛰存在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和沪江大学任教。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被安排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至“文革”前，他在教学之余继续潜心于翻译小说，出版译作多种。“文革”后期，经学校安排与人合译《蓬皮杜传》和参与编写《鲁迅年谱》，“文革”后至今仍继续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先后招收了研读明清、唐代、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生，创办和主编《词学》，辑、编定《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和宋、清《花间新集》各十卷。他整理点校的《陈子龙诗集》和撰写多年的《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唐诗百话》和《词学名词释义》等，也在最近几年出版。他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编《百花洲文库》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外国独幕剧选》，还经常撰写散文、论文、回忆录，相继发表在海内外有影响的报刊上。

二

施蛰存在各高校所开设的课程中，以《中国文学史》和《散文源流》用力至巨，也最受学生欢迎。他在讲授中，独有新见，别具法眼。如对唐诗的讲授，通常均以盛唐为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转衰。施蛰存讲授唐诗指出，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或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

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景象。他讲了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都已讲完，而中唐诗人讲了二十五家却觉得还有好多未讲。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看出中唐诗坛盛于盛唐。他这个论点，独特新颖而又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令人信服。

高适的《燕歌行》是课堂上必定讲授的名篇。此诗文字虽浅显，其题旨却历来众说纷纭，它的历史事实、主题和结构、人物等一向没有弄清楚。施蛰存则引《旧唐书·张守珪传》与本诗互证，指出本诗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之瓜州战功而作，其要旨为歌颂。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升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诗中之地名均在幽州国防线上。此诗后半篇十二句，表达了高适对战争既肯定又憎厌的复杂感情，由此揭出诗题本意。经他这样条分缕析，就将千古之谜轻轻解开。

施蛰存讲授唐诗理论时，也一去前人研究中之疑惑翳影，以清澈鲜明的见解而还其本原。他多次指出，唐人论唐诗都很注重词句的音乐性，初唐到中唐前期的诗人所着重研究的是诗的“格”和“律”。唐人称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为格诗，格诗所强调的“风骨”，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说的“风格”。后世文论家对这一字之变未予充分注意，而常以风格与风骨为不同概念而聚讼纷纭，争论不休。陈子昂、李白、杜甫等都认为诗歌的辞藻和题旨应向魏晋风骨回归，而直至风、骚。他认为韩愈和白居易的诗论继承发扬了传统的六义诗教，同近代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很接近，遂如洪钟震雷惊动了当代，其时诗人却仍以风云花草化为绮辞丽句而成诗。中唐后期至唐末的诗学研究从注重律诗的音律转而为句法，司空图《诗品》所咏叹的典雅诗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而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

施蛰存在《散文源流》的教学中指出，中国不但是诗的国

度，更是有着优良散文传统的国度。学习古代散文，可帮助学生逐步地掌握古汉语。他认为，一般青年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学习古代散文，可从今及古、由浅入深，从近代而上溯古代，上古部分的比重应适当从轻。高校文科专业的学生，则可从先秦散文开始学习。他对每一单元的教学都有其时文学思潮和发展脉络的讲解，并尽量选读典实少而富有情韵的散文。

三

以词学久享盛誉的施蛰存先生，研究词学始于五十年以前。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认为词学盛于宋代而宋人论词的专书不多。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有张炎所撰《词源》，是一部论述音律和作法的词话专书，对当时及其后历代词人均有很大影响。而沈伯时《乐府指迷》及陆辅之《词旨》等书，都寥寥数页无多大价值。然而在诗话、笔记等类著作中，虽偶有论及词学或词之本事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为此他遍阅宋元诗话及笔记八、九十种，辑录词学资料五百多条，后经整理编成《宋元词话辑佚》一书，为宋、金、元词的研究者开拓了学术视野。五十年代末，他开始考虑宋人词集的序跋及诸家藏书著录中，也必有当时学者通人论词的见解，如能辑录成帙，词学研究者也足资参考。因此，他开始抄录宋人词集的序跋及陈振孙《直斋书录》中关于词籍的“解题”。

这一工作开始时仅限于宋代，起初估计数量不多，费三、四个月时间即可完成。但在辑录过程中，发现元、明、清历代学者所撰宋人词集的序跋也很重要。由此，他认为研究宋词不能局限于宋人的著述，于是扩大搜辑范围，凡历代学者给宋人词集所写的序跋，历代藏书家有关宋人词集翻刻的记叙，均为搜辑之列。他找了几位助手帮助抄写，期于速成。但随着搜辑工作的深入，越发感到词学资料浩繁，要全面、系统地研究词学发展史，就必

须打破宋词的藩篱，于是又进一步扩大搜辑范围：上起唐、五代，下迄近代，凡一切词学书籍的序跋和著录，凡有所得一概辑录。如此荏苒四年，累计辑录一千数百篇，共约七、八十万字，作为词学理论和词学通史的研究参考资料，可谓集其大成蔚为大观了。这部珍贵的《历代词籍序跋萃编》，曾屡经灾厄，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几乎被当作废品处理。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来组稿，决定作为重点书出版。于是他收集残余，重行编纂整理，补苴罅漏，另行誊录，又整整费了一年时间。

《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纂的十卷词籍，对后世词的发展影响极大。循沿花间词风，就词史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代和清代，各编一部《花间新集》，是施蛰存多年的心愿。在辑录《历代词籍序跋萃编》的过程中，他时时留意及此，直至《萃编》完成，他才能集中精力选录。终于八阅月选定两宋著名词人之花间遗韵为十卷五百首，加上可与两宋比隆的清代词家十卷五百首《花间词》作，合成一书交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乃乾编纂的《清名家词》在三十年代出版后，受到叶恭绰、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学名家的高度评价。继《清名家词》后编纂《近代名家词》也是施蛰存多年的心愿。近年来他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充分利用上海各高校和学术、文化团体的藏书，决定从清末著名词人文廷式和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开始辑录，至解放前共收六十名家词。书前冠有总序，论述近代词发展的脉络，各家词集之前则分别撰写小序，详列作者生平、词学成就和在词史上的地位。此书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唐代高僧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是词史开创初期“七七三三七”句法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明著名词曲家陈铎的《草堂馀意》，曾被推崇为“全明不能有二”的杰作；明末清初幾社重要成员蒋平阶师弟的《支机集》，是久已隐没的清初重要词派云间派

的词集；晚清重要词人陈庆森的《百尺楼词》从未刊行，百余年来无从见到。这些散佚的词学珍品，都经施蛰存先生钩沉整理后得以推出。他不但多年来对词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极为关切，对词学知识的普及也颇为重视。他的《词学名词释义》，在《文史知识》连载一年后，中华书局又请他增订另行结集出版。

施蛰存先生对词学理论的研究，以词的起源、词调和唐五代词为重点，研究方法以考证和比较为主。谨严缜密、辨伪存真，解决了许多含糊不清或久悬不明的疑题。多年来，词学研究者把词的文学形式名称解释为：“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余。”这里的所谓“又名”，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不明确。明代杨慎作《词品》，把“诗余”解释为诗体演变之余派，从而又引起后代学者纷争不已。施蛰存在《说“诗余”》中，把“诗余”这个名词的出现及其确切的含义，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及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他指出，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人之余事”的概念，但还没有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余”，于是才出现“诗余”这个名词。但是这时候，“诗余”还不是词的“又名”。直到明代张綖作词谱，把他的书名题为《诗余图谱》，从此“诗余”才成为词的“又名”。而在宋人的观念中，“诗余”的含义为诗人之余事或余兴。他通过对这一词学基本概念的考证，勾画了词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轮廓。他的《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详尽地考证了《杨柳枝》词调的历史演变，指出欧阳修的《贺圣朝影》、贺方回的《太平时》是《花间集》中《杨柳枝》的继承。《唐诗宋词中的六州曲》一文，则以丰富的史料，有力的考证，拨去历史的迷雾，详列六州大曲的来龙去脉，从而解决了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比较”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比较文学”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施蛰存在词学研究

中对这两种比较都运用得很广泛。前者,如在《读温飞卿词札记》中,把温庭筠词和李贺、李商隐诗相比较,在《读冯延巳词札记》中把冯延巳词和温庭筠与韦庄词相比较。后者如他在《历代词选集叙录》中,指出五代欧阳炯解释《花间集》的命名很不明确,其后有不少学者强作解人也多为牵强附会。他引韩愈《进学解》、《说文段注》、《声类》和古希腊及近世欧洲各国称诗集为 Anthologe,指出古今中外以花喻诗不谋而合,“《花间集》之取义,殆亦同然”,此可谓通人之解。

创办和主编我国唯一以研究词学发展理论为宗旨的刊物《词学》,是施蛰存先生对词学的重大贡献之一。龙榆生于1934年创编《词学季刊》于上海,对词学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词学研究者和诗词爱好者的广泛赞赏和支持。可惜至1936年抗战军兴而中止。四十多年来词学研究者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个集中研究词学诸问题的学术刊物,能有一块专供他们耕耘的园地。多年来施蛰存心中也一直存有创办《词学》的心愿。1980年,他的这个心愿得到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邀请我国词学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于1981年出版了《词学》创刊号。《词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诗词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创刊号初印一万五千册不够销,又随即加印一万册。中外各大报刊多次发表专文称誉《词学》为“熠熠生辉的词苑奇葩”,“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学术专刊”。至今《词学》已出版的九辑,以词论研究和词学文献整理为主,其所设栏目和所发文章,在内容和编排上均别出心裁,有很强的可读性。施蛰存在他以往的编辑生涯中,录取稿件的原则,一贯是“重作品不重人,重水平不重私交”。他主编《词学》仍恪守这个原则,而对词学研究后继人才的扶持、奖掖尤为关注。因此每辑刊物都有中青年作者的稿件。他还很注重与海外词学界进行学术交流,香港、台湾词学名家饶宗衍、林政仪和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著名学者村上哲见、

车柱环的词学论著都曾在《词学》上刊出。他还特辟“港台版词籍经眼录”，及时评介香港和台湾的词学论著。

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词学论稿》，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收均为师大中文系教师的词学研究论文，集中体现了以词学研究为重点的中文系教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此书对自唐至清末的历代著名词人都有精辟的论述，对词体的起源和形成，词的特殊风格及其发展，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探讨。施蛰存辑录的论文，对词的发展溯源探流中，着重对词的形式和写作艺术进行研究和分析，一反以往词学界长期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历代词学家深受“宋以后而词亡”之说的影响，大都热衷于宋词研究，探讨金、元、明、清词的寥若晨星，以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很薄弱。施蛰存对金、元、明、清及近代词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很关注，在本书中他特地收辑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多篇。尤其对号称词学中兴可与两宋比隆的清词以及左右清词坛数百年之久的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所作的研究，更为着意收录。本书对华东师大中文系在词学理论和词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施蛰存先生在词学界乃至海内外文学界的崇高威望，由于《词学》和《词学论稿》以及一批词学论著的相继出版，华东师大中文系已成为我国颇具影响的词学研究中心之一。经他多年苦心经营和筹划，对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精心指导和提携，现老中青词学研究梯队已形成系列。四位中年教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我国第一部词学批评史已定稿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关词学发展通史、断代史和词学理论研究几部专著都即将完稿。华东师大中文系在1983年和1986年，相继主办了影响深远的全国词学讨论会。他在第一次词学讨论会上致开幕词，第二次词学讨论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使全体与会代表受到很大鼓励。

四

宋元至清通行把“绝句”称为“截句”，认为绝句是从律诗截取一半而成，此说误传至今，流行颇广。施蛰存在《唐诗绝句杂说》中引用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事实，指出绝句的形成早于律诗，“绝”的意思是断绝，“四句一绝”是用四句诗完成一个思想概念，即古人所谓“立一意”。他的《白居易词辨》，对词学界普遍认为白居易作《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等三首，经详尽考证后，以不容置疑的判断指出，这三首词均系欧阳修所作。他还指出近年问世的《全唐五代词》，收白居易词多达三十七首，但旧本所没有而新增补的都为齐言之诗，或以曲调名为题，或沿用唐人一般舞曲题，但其词仍是五七言诗，不能看作为词。另外，一字至七字叠句诗早在六朝时已有，此分明为杂体诗而并非为白居易创调，此书也误为词格而按《词谱》题为《一七令》。

词学界长期来沿袭明代张綖以豪放、婉约两派论词的观点，直至近几年还有学者坚持“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施蛰存在《致周楞伽》的信中指出，豪放与婉约是两种基本的美感形式和风格类型，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其风格常会有所变化，不能简单地划归哪一派。他的这个论点在词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时限起迄，很多著名学者曾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施蛰存则指出近代文学最大的特点是过渡性，是从古典文学过渡到现代文学的桥梁，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他认为近代文学时间的上下限与历史分期的时限应有差别。这个论点也给人很多启发。近几年有不少颇具影响的文论家提出要“重写文学史”，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施蛰存最近在《文学报》撰文指出，文学史不需要“重写”，他认为各种文学史，研究有素者

都可以写，各有千秋，可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文学史不必有固定的模式和定本，每一个文学史家或文论家，在他们的各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累积而构成自己的框架。如果依据别人提供的框架进行研究，势必成为别人写的文学史的注疏，其成果只能是发挥别人的观点。这个论点，对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很有振聋发聩的启示。

施蛰存先生除在唐诗、词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外，对金石碑刻研究较前人也有很大的突破。其专著《水经注碑录》和《北山集古录》，已分别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巴蜀书社出版。《水经注碑录》节取《水经注》中有关石刻之文别为录目，检其出处而征其旧闻，裒集众说予以详加考证。《北山集古录》中碑版题跋各文，或考源流而释文字，或辨真赝而言史迹，或别拓本之先后，或评书迹之优劣，抉疑释难均有新意。

施蛰存先生常将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和学术研究，比喻为给读书界开的“四扇窗户”。他曾以成功者的自豪和欣慰告诉笔者：“东窗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是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南窗指文艺写作，我是南方人，求学、工作和生活也长期在南方，我的文艺作品中自然有楚文化的影响和传统，因此自喻为南窗；北窗指近二十年所从事的金石碑刻研究，因这是冷门。”施蛰存是蜚声国际的一代文人宗师，又是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研究生和海内外访问学者，每到他书房听课，师母必一一亲为奉茶，他也必在前一天放下学术研究认真备课。他胸襟豁达，语言生动，妙趣横生而又含意深隽，使学生如坐春风如沐时雨。他从事学术研究或编纂书刊，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他人。他极喜奖掖后进，常将节衣缩食苦心搜购的珍本秘籍慷慨借人，或为青年教师的书稿密注笺条，详提修改意见，而不要任何答谢。前几年他在华东医院住院一年多，在病房中仍坚持为《词

学》审稿，有的稿件模糊不清，他抱病亲为修改誉录，高风亮节感人至深。他在逆境中从不灰心气馁，而以强毅之力不断拓展出新的学术天地，为读书界打开敞亮的知识之窗。

施蛰存现已年过八旬，但老而弥健，壮心不已。近年上海书店推出大型文化工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共两千多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卷的系列丛书，由他和其他几位名家负责总纂，他亲自主编的三大分卷二百多万字的大系翻译文学卷，按排列次序殿于大系最后，但其出版却在在大系各卷之先，为大系的成功推出，开其先声奠定基础，在学术界和读书界激起巨大反响，赞誉毕至。他为翻译文学卷撰写的一万八千多字的序言被《中国文化》、

《文学报》、《澳门日报》等多家海内外报刊竞相转载，被推崇为“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巨大突破”，“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填补了空白”。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浮生杂咏》第一部分六十首刚连载完毕。他筹划多年的《文艺百话》、《文坛百忆》二书已完成了大部分，《唐碑百选》则已定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词学》和《外国独幕剧选》的编纂工作仍要他主持，他也还为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上课。最近又应上海学林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有关历代文物考证和欣赏的专著。他虽年高德劭，著作等身，誉满中外，但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向读者贡献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